

清代民国时期的茶馆(续)

解放军理工大学 陶德臣

三、清代民国茶馆的主要功能

上述可知,清代民国时期茶馆经营方式极为灵活多样。与奠定中国茶馆业传统经营方式和功能的茶馆业发展第一个高潮两宋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拓宽,有些经营方式则是首创。与此相适应,清代民国时期茶馆功能也在继承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茶馆功能更加多样化。这是茶馆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必然结果和基本前提。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茶馆功能定位,必然就有什么样的经营方式;反之,选择什么样的经营方式,必然就会达到什么样的经营效果。总结清代民国茶馆的经营实际,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认为清代民国时期的茶馆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1、休闲娱乐功能。中国人上茶馆,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更主要的是精神生活的需要。茶客之所以把饮茶地点从家里移至茶馆,除了茶馆消费比较方便外,最根本的是在家里饮茶与在茶馆饮茶的环境、气氛迥然不同。说到底,茶客们在饮茶的同时,更多是把上茶馆饮茶作为一种放松、休闲方式,特别是茶馆有种种娱乐活动,让茶客乐不思蜀。清代民国时期,茶馆作为休闲娱乐的主场所,是它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托。当然,这种功能由来已久,只不过清代民国时期更加强化。上茶馆的人形形色色,茶馆成为休闲中心。老人、闲人进茶馆,一边饮茶一边消磨时光。其他如商人、手工业者、官吏、文人走进茶馆,也有人忙里偷闲,把茶馆作为精力加油站和烦恼遗忘地。况且,茶馆布置考究,挂张字画,使人赏心悦目,令人留连忘返,更有弹唱、评书、曲艺、清唱、戏剧、棋牌等当时最流行的娱乐项目,茶客们在茶馆一边品茶,一边赏美景、观字画、听音乐、看戏曲、玩鸟雀、斗蟋蟀、下棋打牌,从而得到身心愉悦,忘却痛苦与烦恼,重新振作起精神。更有甚者,如北京的京剧票友,自娱自乐,不但丰富充实了生活,增加了乐趣,而且结交了大量朋友。正因为茶馆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功能,各地茶客趋之若鹜,接踵而至。“茶馆,是供歇息、娱乐及消遣闲暇的场所,休闲、轻松、祥和,是茶馆的特有环境气氛,忙人进入茶馆,举止便显优闲;怒人进入茶馆,心境便趋和平;粗人进入茶馆,言行便有礼度;急人进入茶馆,心情便觉舒缓;愁人进入茶馆,情绪便变开朗,人与人之间,处在一种自由、亲善、清静、无为的心态之中。人们在这里可以体味到尘世喧嚣中所难以体味到的人性善与人情美”⁽⁹²⁾。上茶馆,作为中国的特有现象,确实深受人们喜爱。清末上海茶馆简直是人声鼎沸,1899年出版的日本人中村佐治郎《支那漫游谈》对此有详细记载:“上海的繁华街道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其中又以四马路为最繁华。去四马路,就会见到茶馆。这些茶馆约有二十家,大抵都是三层、四层的楼房。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到晚上十二时左右,连三楼、四楼都坐满了茶客。大约一家茶馆有七、八百茶客。茶客更多的时候会到千人以上,都坐在椅子上交谈。进入茶馆,首先就会拿来茶壶茶碗。每日朋友同道谈话交游。如想吃点心的话,其处各种茶点应有尽有,可买来吃,若不想吃的话,不买亦可。此外,茶馆中又有吸烟室,此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在这里抽烟一小时需付一定的钱,抽烟二小时付的钱亦相应增加。无论何时,入室抽烟者或为30人,或为50人,总是一边吸烟,一边交流。每个茶馆这样的场所约有几处。日暮之后,是茶馆营业最盛之时,馆中客满,各自一边饮茶一边喧闹交谈。其中亦有女子盛妆打扮来此,这是为的吸引茶客。茶馆中附设卧处,其中亦有椅子供坐,一边品茶,一边听艺妓弹奏琵琶,哼唱小曲,弹奏木琴,演奏音乐。这可由五人或七人轮流来作。这种艺妓如果色艺不精,花上一元钱,就可使其立刻来到茶客旁边递烟送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于这样,支那人都愿前往

茶馆,饮茶,说无聊的话,以相互消遣。通常往来四马路者,多乘坐马车、人力车,艺者则或乘轿车前往⁽⁹³⁾。这就是一幅典型的消遣休闲娱乐图。景春楼、玉液春茶楼、第一楼及城隍庙的春风得意楼、爽乐楼、乐辅阁、四美轩、里园等都是有名的书场式茶馆。到这里来的人休闲娱乐是其主要目的,所以时人对上海茶馆茶客的入馆动机描绘都有休闲娱乐的功能。湘湖仙史《洋场繁华小志》:“啜茗先登阆苑楼,往来蜂蝶尽闲游。品题要具评花眼,谁是神仙第一流”,描绘了游人大茶馆阆苑第一楼休闲的情景。刘豁公《上海竹枝词》:“是谁作俑紊风规,博士头衔到女儿。新式茶堂陈百戏,令人迷惘夜归迟”,原注云:“某游戏场,近于临街楼上设一新式茶堂,亭台池阁,粹于一楼,杂置灯彩戏曲,以娱座客。茶博士悉为妙龄女郎,打情骂俏,在所难免。登徒子趋之若鹜,固其所也”。显然,被吸引来此饮茶的茶客都是“有闲一族”。新式歌舞兴起后,茶客更是乐此不疲。余槐青《上海竹枝词》云:“安乐窝还小广寒,青莲阁上更盘桓。迄今游冶成陈迹,群众争趋歌舞团”。以上提到的这三处茶馆“皆为游客啜茗所歇之处,今则各处歌舞团,游客最盛”。

城市中入茶馆娱乐消遣的人不在少数。江苏常熟,清末民初时有个枕石轩茶馆,人称“老爷茶馆”,茶客都是辞职还乡的官吏,每天坐着轿子去茶馆吃茶。这些茶客把上茶馆当作每天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借以充实生活。民国期间浙江海宁新桥堍的“长乐茶馆”,茶客均是当地政府官员、地方缙绅、有钱的大老板、富甲一方的地主,他们进茶馆吃茶听戏,好不自在。当然,农村茶馆设备、娱乐项目稍差一些,但茶馆同样也是人们休息、娱乐的主要场所,以至于清末民初一些人简直整天沉缅于茶馆而不能自拔,“乃竟有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⁹⁴⁾”的现象,实则是茶客把消遣娱乐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了,这也是茶馆功能强大的证明。

2、止渴充饥功能。不可否认,茶馆的基本功能和生存方式就是向茶客出售茶水,离开了这一功能,就不能称之为茶馆。要让消费者走进茶馆消费,必须有一些基本条件:如消费便捷,服务周到,茶类丰富,茶资适当,经营灵活,茶馆众多等。应该说,清代民国时期茶馆业在这些方面做得都比较好。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的茶馆,组成了档次有别、分类明确的茶馆网络,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茶客的不同消费需求。茶馆每天的营业时间很长,大多达到十七、八个小时,茶客走进茶馆,可以饮用到高低有别的各种茶叶,而且消费时间不受限制,在茶馆中爱坐到什么时间就坐到什么时间。茶资便宜是人们乐于赴茶馆消费的重要内容,除了高档茶馆外,一般茶馆的饮茶费用大大低于入酒肆消费,每次饮茶仅需数文。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云:“乔老于长堤卖茶”,“每茶一碗二钱”。徐珂《清稗类钞》载有李客山“良友至,辄呼一童取一钱,就茶肆浚茗,共啜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记盖宽开茶馆的“利钱有限,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申报》所载《茶馆热闹》云,天津“茶馆内卖茶,每杯六文。若是客人想多加一包茶叶的话,其价格亦仅增一倍。所以虽然座上常满,但仍生意微,鲜有人能数出者”。这么低的费用,平民百姓也能承受,因而民众将茶馆利用日常化,经常出入茶馆饮茶。哪怕是贩夫走卒、纤夫工匠,渴了累了,照样走进茶馆饮茶消渴,恢复体力。

茶馆提供茶水的同时,往往兼卖点心,甚至兼营餐馆,这方便了茶客。佚名《春申浦竹枝词》“专供顾客息游踪,茶馆精良算广东。既使相如疗渴症,点心又可把饥充”,就是指上海广式茶馆止渴充饥的两大基本功能。这种经营方式极为普遍。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提到的扬州人早上入茶馆,有些人直到中午才离开,渴了饮茶,饿了食干丝。至于说如镇江所开的萃茶馆则是茶馆与餐馆的结合,而经营重点是餐饮方面,此类茶馆在“止渴”与“充饥”之间,服务重心是吃饭而非饮茶,其功能与一般茶馆的“饮茶止渴”当有更大区别。但不管怎么说,茶馆提供茶水给消费者的一大目的当是止渴,而同时又提供点心其他食品,可以让消费者填饱肚皮,解决空腹饮茶带来的问题,从而达到留连茶客、增加收入之目的。

3、信息传播功能。不言而喻,有些茶客钟情茶馆的重要原因是茶馆实属无形信息中心。在这里,各种信息得以汇集、交换,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传播。旧社会通讯、交通手段落后,各地相对比较闭塞,信息缺乏有效传播手段,而茶馆却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此一缺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官吏、商人、艺人、手工业者、市民、农民、文人、军人、闲人、流氓、地痞、妓女、黑道人士、帮会头目,也有革命志士等,形形色色的人都涌入茶馆,他们年龄有差,职业身份有别,在茶馆高谈阔论,进行公开交谈,带来了各方面不同的信息,有意无意地传播给别人,又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其他信息。这一信息交换平台被各种人犹如俱乐部似的无偿利用着,有些人则专门从茶馆信息中获取自己有用的东西,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1859年,英国宝顺洋行买办容

因在上海某茶馆饮茶,与众茶商交谈中得到一重要信息,即:“安徽太平县茶,或谓该处有绿茶百余万,已装箱准备出口,不幸尽落太平军之手,此时设有人能冒险,向彼军取回,钜富可致”。容闳抓住此商机,经周密安排,认真调查,果然发现“太平县全境计之,当不下百五十万箱”茶,他仅在2星期内就购得绿茶28船,前后6个月共计购绿茶6.5万箱(每箱约60磅),从而赢得了洋行的信任⁽⁹⁵⁾。可见,茶馆里有许多商业信息十分有用。正因为如此,各行各业均以茶馆为地点,有目的定期进行聚会、信息交流,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各种行业的交易市场。乡镇茶馆则成了农民买卖粮食等农产品的场所。做工人员则利用茶馆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寻到主顾。一些不满时局的人则在茶馆中发表各种评论,惹得密探、特务潜入茶馆来“包打听”,茶馆老板怕出事,贴出“莫谈国事”的告示,其实这恰恰说明茶馆是政治消息的重要传播地。革命党人和革命志士则利用茶馆是个“五方杂处”、三教九流无不毕至的环境,开展革命活动,传递信息。黑道人们、帮会头目则利用茶馆接头,进行各种秘密活动。而普通老百姓则在茶馆谈论鸟雀蟋蟀的经验、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花边新闻等。当然,茶馆又是知识的传播和学习之地,许多新知识首先以新闻形式从茶馆中得以传播。

4、展示传承功能。清代民国时期茶馆业竞争十分激烈。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吸引茶客赢得利益,几乎所有茶馆均极其所能从硬件和软件两大方面着手改善茶馆条件。硬件方面,主要是对茶馆内外进行精心布置、精美装饰,突出个性。比如:撰写精美对联,悬挂名人字画,摆设精美家俱,优化环境。这样做的目的,无形之中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和熏陶,久而久之,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茶客头脑中扎下了根,得以延续。软件方面,提高服务质量,吸引茶客的一个普通有效手段就是强化娱乐功能,尤其是让茶馆经营与杂剧团、说唱者等各种各样的艺人相结合。这一结合,实现了茶馆和艺人的双赢,更重要的是各种地方戏剧、评书、弹唱、大鼓、曲艺等民间艺术、戏曲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艺人在茶馆展示这些艺术形式,艺术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而这些艺术通过茶馆得以传播,茶客在消遣娱乐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培育了精神文明,提高了文化素养。许多目不识丁的茶客竟能说古道今,评论艺人水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茶馆的熏陶。无疑,茶馆是文化教育和传播的学校。

5、社交会友功能。茶馆的“期朋约友会聚”功能自古有之,但清代民国时期这一功能被放大了。茶馆消费低廉,环境优良,娱乐节众多,极利会朋交友。海上闲鸥《洋泾竹枝词》说到:“丽山台同万仙台,两家茶社最称佳。分明呖尺巫山里,莫约朋侪此处来”,说明“高屋三层傍水隈,玻璃四面绮窗开。看花消渴都来此,绝妙风情丽水台”⁽⁹⁶⁾。此高级茶楼同样是社交会友的好去处。由于会友社交的需要,茶馆或辟有雅室,或对茶馆进行专门装饰以满足其需求。如王亦损《淞南梦影录》载:上海大茶楼阆苑第一楼,“洋房三层,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宫,真觉一空障翳”,引得“远方之初至沪者,无不趋之若鹜”。这些装饰豪华的大茶馆成为会友的首选。既然茶馆成了人们社交活动的中心,不同社会阶层就会聚集在不同的茶馆进行活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人员相聚在一个茶馆了。如成都一品轩、凌烟阁、儒林茶馆是士林学子相聚的地方,妙高楼、蓬莱、禅鸣、十二楼则是宗教界人士交往的茶馆,荣盛、鸿兴、安乐寺、庆余等茶馆又是商贸聚会茶馆,真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浙江海宁硤石镇130多家茶馆形成了米市茶馆、丝茧牵头茶馆、同业茶馆、鸟蟋茶馆、戏迷茶馆、忠义茶馆、报界茶馆、官员茶馆、航班茶馆、网船茶馆、鲁班茶馆。这种不同的人相聚在不同的茶馆,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交目的。如果说这种社交具有职业需要的话,那么因私事与熟人、朋友、亲戚相会时,也带到茶馆进行磋商,这已经成为风气,富人如此,贫人也这样。那些“劳心劳力,终日勤苦,偶于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淪茗深谈”⁽⁹⁷⁾的人,也很常见,所谓“无论贵贱贫富,类似淪茗清谈为事,或有晨夕两次者,或有每日一次者,甚有甫游此间,倦而欲返,出门又遇他友,重入茶园者”⁽⁹⁸⁾,实质表明与朋友入茶馆谈心成为时尚。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人们更需要开展社会交往,会见朋友,以期谋求生存机遇。

6、行业会聚功能。各行业将一定的茶馆用作集会场所,在茶馆中协商本行业的重要事项,或举办“摇会”。这一现象在清代民国时期极为普遍和常见,几乎成为通识。上海作为旧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行会在茶馆中的活动相当活跃。各行业的商人们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相聚在一定的茶馆,相互交换信息,联络感情,洽谈交易。如煤炭商人、棉花和棉籽商人等相聚于青莲阁,杂粮商人等汇聚于杏花楼,颜料杂料商人聚于长乐茶馆,洋杂货商人和面粉商人则聚集于怡珍茶馆,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各行各业的商人聚集在特定的茶馆⁽⁹⁹⁾。

商人利用茶馆作为行业聚会之所,工匠、船夫、车夫等都市的下层社会人员也都是如此。上海的船夫们把北河南路的日升茶楼、小车夫们把嘉兴路的某一茶馆用来作为自己的集会场(100)。苏州织机房的工匠们把临顿路的新园茶园作为早晚聚会之所,每逢罢工,终日聚集该茶馆,气势颇盛(101)。南京临时雇佣的织棉工,每天清晨聚集于丹凤街的三元茶馆或北门桥的顺兴茶馆,在这些茶馆处接受当日工作,由来已久(102)。

杭州的官僚大多聚于萃芳茶店。其他各行各业基本都有自己聚集和谈生意的场所。如曲艺人聚于南玉巷茶馆,水果店聚于万安桥水果行茶店,养鸟者聚于雅园胡儿巷茶馆,收旧货商人聚于青莲阁茶室,会董钱庄大户聚于钱业会馆茶馆,木匠业聚于堂子、城头巷茶馆(103)。1913年喜雨台茶楼建立后,各行业聚会均转到该馆,行业茶会均有特定的座位。有的茶馆已发展为专业性交易场所。浙江海宁硖石镇的大富贵茶店,是商界各行业同业茶会开展的地方,每到晚上,各行业人员都聚集在各自的同业茶会上,一边喝茶,一边交换外行行情,或解决同业中的一些矛盾纠纷,一些日行货价,也在这里拍定,茶钱由同业公会总付。船工、脚夫则聚于聚仙阁茶店,捕捞鱼虾鳝鳖的,聚于芦扉汇茶店,木匠、泥水匠聚于西雅园茶店(104)。江苏镇江做粮食生意的商人都上惠风茶坊,油漆匠、瓦木匠、成衣匠、四拼匠相聚天源楼茶坊找主顾,做小本生意、转手贩卖的“二道贩子”以及医卜星相,进城卖菜的茶农,相聚鸿翠茶坊、如意茶坊(105)。四川成都商贸聚会的茶馆有荣盛、鸿兴、安乐寺、庆余等。

7、市场交换功能。有的茶客下茶馆,不仅仅是饮茶,特别对于商人来说,往往通过茶馆,以饮茶为媒介,达到洽谈生意的目的。一般百姓也常常利用茶馆来进行商务交易。前述茶馆的行业会聚功能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交易功能。茶馆洽谈生意,容易成功,双方同坐一张茶桌,气氛友好、轻松,一边喝着茶,一边朋友式地进行交流,将激烈的讨价还价变成心平气和的洽谈,即使谈不成生意也算交了个朋友。普通老百姓找工作、主顾,往往也借助茶馆来达到目的。至于说活跃于茶馆中的掮客、房屋中介人员等,也对促成交易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清代民国时期,茶馆作为休息的场所、社交的场所、集会的场所、交易的场所,得到了广泛利用,尤其是作为交易的场所,即市场功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因为此,城乡之间逐渐形成了以茶馆为中心的各类行业交易市场,茶馆的经济功能十分明显。如杭州和园茶楼为鸟雀市场,补经楼为土纸、锡箔市场,曲江茶楼是大米市场,喜雨台简直就是个大综合交易市场,古玩、书画、纺织、粮油、房地产、营造、水木作、柴炭、竹木瓦、饮食、水产、花鸟、虫鱼等行业汇聚此地,洽谈生意,等候招揽。浙江海宁硖石的“米市茶店”是米商谈生意、休息的场所,挹园、惠福、近山记等茶馆是“丝茧牵头茶店”,牵头从中接头促成交易,抽取佣金。湖北武汉德心茶馆为船只结算运费和粮食交易场所,安乐泉茶馆为织布业、水产、山货、水果市场,话雅茶馆是大柏木船上的船民和乘客喝茶了解行情或进行交易的场所,抗战胜利后则成了“跑单帮”的销售货者和银元贩子的买卖场所。进出清香茶泉的茶客是肩挑小贩,他们在茶馆进行交易(106)。南京夫子庙的义顺茶馆是介绍房屋买卖租赁的中间人“房牙们”及手艺人活动的场所。房牙们品茗时相互打探,交换信息,兜揽生意,手艺人则寻觅雇主。做各类生意的商人、经纪人则汇集奎光阁讲行情,谈生意。上海经济发达,经济功能的作用尤其明显,市场交易式的茶馆相当明显。茶馆是商人、掮客、手艺人聆市面,谈生意找生活的聚散地,这就是茶馆市场的典型表现。据吴承联《旧上海茶馆酒楼》记载:到解放前夕,上海27家茶楼内就有70多个行会的茶会市场,经常参加茶会活动的约有5600人,其中坐商1000余人,小商贩500余人,其余都是掮客。各个茶会都有不同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如青莲阁茶楼,二楼上午有麻袋业、新服装业茶会,下午有砖灰业茶会,并在茶楼设来货登记,三楼上午有颜料、印染业茶会,下午有飞花业、建筑材料、营造业茶会,这些茶会均是交易的好地方。春风得意楼竭力招徕一批商家贵客,为他们晤谈应酬、交易记市提供方便,一时布业、豆业、钱业、糖业等各式商贾,进出络绎不绝。这种茶会,该茶楼下午有化工原料业近200人,其中商贩近160人,居间人近40人。城隍庙有的茶馆是做鸽子生意人的汇集点,鑫福茶馆是做木材生意人的地点,不少行会均在茶馆中交易。其他茶馆也具相当显著的市场功能。

当然,不只城市茶馆的市场功能突出,农村市镇的茶馆也具有相当显著的交易功能。这一点,尤其是在发达的江浙等沿海地区更加明显。每年茧、丝、新米上市时,农民即在茶馆打探市价行情,经营茧丝米及其他农副产品的掮客亦出没其间,从事撮合赚取佣金。可见,茶馆成了商品信息中心和交易中心,对促进农村商品经

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应该说,清代民国时期茶馆业特别发达,从根本上说是商品经济发展和茶馆作为商品交换场所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8、吸纳就业功能。清代民国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破产失业的贫民不在少数,这些人大部分进入茶馆就业,找到了一块安身活命之所,茶馆从一定程度上成为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暂时避难所和落脚点,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千百年来,茶馆作为服务业的本质没有变,茶馆从业人员不需要什么文化技术,这就为广大中下层人员找工作提供了可能。茶馆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茶馆老板虽形形色色,但相当一部分是家庭经营的小本生意。茶博士很辛苦,但仍可贴补家用,勉强度日。茶馆里的各种艺人,一般收入也不高,许多人遭到流氓的欺负。那些小贩及其他服务人员,属劳动大众,他们在茶馆中找到了一定工作,有了一定收入。以茶馆为衣食之地的人们,还有擦皮鞋的、卖药的、卖报的、挖耳的、修脚的等。可见,茶馆养活了一大批穷苦百姓⁽¹⁰⁷⁾,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场所,对改善贫民生活,缓和社会矛盾多少起了点作用。

9、仲裁审判功能。清代民国时期,茶馆盛行“吃讲茶”之风,江浙一带尤其盛行⁽¹⁰⁸⁾。徐珂《清稗类钞·上海地棍之吃讲茶》对此风俗有记载,云:“吃讲茶者,下等社会之人每有事,辄就茶肆以判曲直也。凡肆中所有之茶,皆由负者偿其资,不仅两造之茶钱也。然上海地棍之吃讲茶,未必直者果胜,曲者果负也。而两方面之胜负,又各视其人之多寡以为衡,甚且有以一言不合而决裂用武者,官中皆深嫉之,悬为厉禁”⁽¹⁰⁹⁾。“吃讲茶”的基本方法是争执双方来到茶馆,由有权势、有威望的人主持,通过双方申辩,最后由听众或主持人裁定谁曲谁直,然后“众咸以甲为理直,乙亦自悔,愿赔礼释怨”⁽¹¹⁰⁾而作罢。在这里“讲茶”的当事者分别为原告和被告,茶客为旁听者,具有法律审判的性质。至于仲裁是否公正,调解停是否有效,就只有天晓得了。但不管怎样,在茶馆普及的江浙地区,茶馆作为这种仲裁审判的“法庭”得到了广泛运用。人们有了争执,公开抛开官府,更愿意到茶馆中去评评理,听听公众的意见。显然,这种“原为苏杭之陋习”的“讲茶”之风得到了民众的极大欢迎,以致迅速在上海、常州、南通、福州等沿海地区传播开来,动摇了官府的权威,引起了政府的极大恐惧,因而申令禁止,但仍呈现“随禁随犯,肆无忌惮”⁽¹¹¹⁾的状况。可见,茶馆“讲茶”作为简单的仲裁、裁判的好处受到民众喜爱,这是官府三番五次申令禁止无效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真正办案的茶馆。上海有“包打听”茶会之说。巡捕房的巡捕、侦探不仅经常从茶馆中得到破案信息,有时干脆把茶馆当成了公事房,在茶馆中办案。如十六铺望江楼茶馆就是租界巡捕办案常去的主要茶馆。这实际上是私设公堂,在旧中国见多不怪。

10、人才市场功能。入茶馆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这里既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藏垢纳污之所。许多人把茶馆作为展示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或者通过茶馆成为成功者,茶馆起到人才交流中心和人才交易市场的作用。中国的戏剧、曲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茶馆的繁荣。在茶馆中,一批业余艺术家演技水平日臻完善,博得了茶客的喜爱,也成为各茶馆争相邀请加盟对象。一旦与名演员签约,抓住艺术名角不放,茶馆必定财源滚滚。有些高档茶馆,更是不惜一切代价邀请当红艺人来茶馆演出。这样,茶馆不但造就了名艺人,也是艺人流动的重要场所和交易中心。至于说到茶客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茶馆找到工作,也是茶馆作为人才市场的典型例子。据说,当年成都茶馆又是“腊月人战”的场所,以成都为中心的周围10多个县的中小学教师求聘争夺战,每年寒暑假,校方和待聘教师相聚于茶馆,在茶桌上议定致聘。这种专门人才招聘会的地址设在茶馆,表明茶馆是人才自由市场。这是何满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历史掌故⁽¹¹²⁾。而1948年因省立杭州师范新任校长一次解聘47位教员中的31位,引起普遍不满,解聘教员在湖滨茶室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这些教员平时相聚湖滨茶室,探讨问题,相互介绍工作事宜,该茶社当为人才市场无疑。应该说,商品经济越发展,茶馆作为人才市场的作用也越明显。

总之,清代民国时期的茶馆功能已基本形成集经济、文化、政治性能于一体的较为强大的社会功能。与茶馆功能基本形成时的宋代相比,清代民国时期茶馆功能有了新的发展,经济上成交,艺人演唱献艺,帮会行业集会,民事评理,新闻传播,知识信息交流等,近代茶馆的种种功能已经形成,尤其是经济功能明显,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自宋代已出现的茶馆的一些阴暗污秽现象到清代民国时期泛滥成灾,如买官卖官的政治活动、看相、算命、卖春宫、拉皮条、卖色相、吸鸦片等活动渗入茶馆,黑帮利用茶馆进行各种犯罪

活动,不时在茶馆中大打出手,搞得乌烟瘴气,使茶馆优雅的环境荡然无存。少数人整天无所事事,泡在茶馆中玩物丧志,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已经完全走向了茶馆文化的反面。所以说,晚清时期茶馆助长了中国人不少劣性恶习,中国的茶馆文化走向衰落,以至到建国后完全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消失,也属正常现象。

2006年11月14日草成,11月20日修改完,2008年10月11日再次修改

注释:

(1)陈宗懋主编:《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572页。

(2)杨永兵:《试论宋代茶馆的功能》,《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3)长期以来,中日学者对茶馆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仅陈文华先生主编的《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上就刊有《茶馆》专栏,发表了许多文章,重要的有:左润华《话说北京茶馆》、蔡泉宝《江南的茶馆文化》、张琳《南昌的茶馆》(该刊1991年第2期)、闵宗殿《茶馆历史杂谈》、黄长椿《茶馆史话》、郭羽《漫话成都茶馆》(该刊1991年第4期)、李江《清代都市茶肆品茶述略》(该刊1992年第2期)、杨忠义《成都茶馆》(该刊1992年第4期)、赵映林《十里秦淮茶馆簇拥》、张寿祺《近百年来广州茶座风情的变化》、谢茂权《旧上海茶楼甲天下》(该刊1993年第2期)、赵映林《镇江茶馆寻踪》(该刊1993年第4期)、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考·茶馆》(该刊1994年第2期)、郎慕中《上海茶馆掌故》(该刊1994年第4期)、倪群《近代上海的茶馆》、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该刊1995年第4期)、卢茂村《合肥老茶馆叨古》(该刊1997年第2期)、罗家庆《湖州的茶馆》、郎慕中《江南水乡茶馆风情》(该刊1998年第4期)、倪群《南宋杭州的茶馆》、刘盛龙《旧时茶馆里求食的芸芸众生》(该刊1998年第4期)、朱郁华《老舍与北京茶馆文化》(该刊2002年第4期)、杨永兵《试论宋代茶馆的功能》、陈永华《清末以来杭州茶馆的发展及其特点分析》、冯祖祥等《湖北茶馆》(该刊2004年第2期)。日本学者对茶馆的研究见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及该文相关介绍内容中(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4)李劫人:《暴风雨前》,《李劫人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340页。

(5)徐珂:《清稗类钞》第47册《饮食类·茶肆品茶》,商务印书馆,民国7年版。

(6)转引自(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7)倪群:《近代上海的茶馆》,《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

(8)蔡泉宝:《江南的茶馆文化》,《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

(9)(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68《禁妇女上茶馆》。

(10)赵映林:《镇江茶馆寻踪》,《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

(11)(清)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书牍卷之九”。

(12)赵映林:《十里秦淮茶馆簇拥》,《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

(13)《申报》,光绪二年五月一日,《茶客还金》;《申报》,光绪二年六月一日,《开肆逃债》。

(14)(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15)(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3。

(16)(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7。

(17)(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3。

(18)(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1。

(19)(20)《申报》,光绪六年七月六日,《书劝捐米以济直省工賑启后》。

(21)陈永华:《清末以来杭州茶馆的发展特点分析》,《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倪群:《近代杭州茶馆》,《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

(22)东亚同文书院第九期《孤帆双蹄》,东亚同文书院,1912年版,第258-259页。转引自(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23)周芾棠:《绍兴茶馆见风情》,《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

(24)《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第148页。管家芬:《羊城茶楼拾零》,《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

(25)广州市市政厅总务科编辑股编:《广州市市政概要·广州市公安局警察区域店铺类别表》1922年印行。转引自张寿祺:《近百年来广州茶座风情的变化》,《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

(26)广州市市政厅:《新年特刊·广州市商业分类表》,1929年印行。转引自张寿祺:《近百年来广州茶座风情的变化》,《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

- (27)钱大宇:《文化的积淀,艺术的显示,礼仪的弘扬》,《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
- (28)(29)《重庆市茶叶内销概况》,《中农月刊》,第4卷第3期,民国32年3月30日。
- (30)《北京茶叶之需给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79号。
- (31)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第157-169页。转引自闵宗殿:《茶馆历史杂谈》,《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
- (32)陈彬藩:《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69页。
- (33)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第157-169页。转引自闵宗殿:《茶馆历史杂谈》,《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
- (34)《申报》,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茶馆热闹》。
- (35)卢茂村:《合肥老茶馆叨古》,《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
- (36)民国《湖北通志》卷21《风俗》。
- (37)冯祖祥、姜元珍:《湖北茶馆》,《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田梅村:《旧时代武汉茶馆见闻》、龙丛启:《也谈武汉的茶馆》,载《武汉文史资料》1984年第18辑、1985年第1辑)。
- (38)参张琳:《南昌的茶馆》,《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王龙志:《南昌新旧茶馆文化》,《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
- (39)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饮食类·茗饮时食盐姜菜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20页。
- (40)(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 (41)(43)(47)蔡泉宝:《江南的茶馆文化》,《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
- (42)潘君明、李淡明:《漫谈常熟茶馆》,《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
- (44)(49)闵宗殿:《茶馆历史杂谈》,《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
- (45)蔡泉宝:《宜兴的茶馆》,《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
- (46)郎慕中:《江南水乡茶馆风情》,《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
- (48)道光《瓊泾志》卷1《流习》。
- (50)同治《南浔镇志》卷23《风俗》。
- (51)民国《南浔志》卷31《风俗》。
- (52)徐志明等:《皖西的簪民与茶馆及其它》,《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
- (53)(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 (54)(日)竹内实:《茶馆》,大修馆书店,1974年版,第4-7页。转引自(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 (55)刘盛龙:《宜宾茶馆文化——唱玩友》,《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
- (56)陈永华:《清末以来杭州茶馆的发展及其特点分析》,《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
- (57)雷友山:《浅谈武汉茶馆的过去和现在》,《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
- (58)蔡泉宝:《江南的茶馆文化》,《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
- (59)闵宗殿:《茶馆历史杂谈》,《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
- (60)徐光明等:《皖西簪民与茶馆及其它》,《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
- (61)陈彬藩:《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769页。
- (62)翼化堂:《禁止花鼓串客戏议》,余治:《得一录》卷11。
- (63)闵宗殿:《茶馆历史杂谈》,《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
- (64)赵映材:《十里秦淮茶馆簇拥》,《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
- (65)倪群:《近代杭州茶馆》,1999年第2期。
- (66)(清)陈恒庆:《京师茶馆》,《读书稀庵笔记》,第154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
- (67)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第159页。
- (68)卢茂村:《合肥老茶馆叨古》,《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
- (69)徐珂:《清稗类钞》第47册《饮食类·茶肆品茶》,商务印书馆,民国7年。
- (70)左润华:《话说北京话》,《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
- (71)(清)陈恒庆:《京师茶馆》,《谏书稀庵笔记》,第154页,近代史料丛刊本。
- (72)冯祖祥、姜元珍:《湖北茶馆》,《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 (73)倪群:《近代杭州的茶馆》,《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

- (74)郎慕中:《江南水乡茶馆风情》,《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
- (75)蓝翔:《上海老虎灶录踪》,《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
- (76)雷友山:《浅谈武汉茶馆的过去和现在》,《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
- (77)孔另境:《庸园集·故都之旅》。
- (78)《都市的风光·北平》。
- (79)(清)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7,江苏《禁开场聚赌示》。
- (80)(81)《申报》同治十二年九月廿八日,《记乡村茶馆聚赌烟灯小押事》。
- (82)《申报》光绪七年七月廿一日,《认真拿贴》。
- (83)同治《南浔镇志》卷23《风俗》。
- (84)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风俗》。
- (85)民国《海宁州志稿》卷40《风俗》。
- (86)(日)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版,第68-70页。转引自(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 (87)王亦坝:《淞南梦影录》。
- (88)《申报》同治十二年九月廿八日,《记乡村茶馆聚赌烟灯小押事》。
- (89)(日)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版,第68-70页。转引自(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 (90)徐珂:《清稗类钞》第47册《饮食类·茶肆品茶》,商务印书馆,民国7年版。
- (91)张春花:《洋场繁华小志》。
- (92)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
- (93)转引自(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 (94)徐珂:《清稗类钞》第47册《饮食类·茶肆品茶》,商务印书馆,民国7年版。
- (95)(清)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二章《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96)佚名:《春申浦竹枝词》,转引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考·茶馆》,《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
- (97)徐珂:《清稗类钞》第47册《饮食类·茶肆品茶》,商务印书馆,民国7年版。
- (98)《申报》光绪六年七月六日,《书劝捐米以济直省工賑启后》。
- (99)(日)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中),日本堂书店,1920年版,第248-257页。转引自(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 (100)(日)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中),日本堂书店,1920年版,第248-257页。转引自(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 (101)《申报》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吴中琐事》。
- (102)南京博物院民族组:《清末南京丝织业的初步调查》,《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 (103)陈永华:《清末以来杭州茶馆的发展及其特点分析》,《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 (104)郎慕中:《江南水乡茶馆风情》,《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
- (105)赵映林:《镇江茶馆寻踪》,《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
- (106)冯祖祥、姜元珍:《湖北茶馆》,《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 (107)刘盛龙:《旧时茶馆里求食的芸芸众生》,《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
- (108)(日)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 (10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89页。
- (110)《申报》光绪八年三月廿五日,《苏台杂事》所记“讲茶”。
- (111)《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五日,《讲茶滋事》。
- (112)钱大宇:《文化的积淀,艺术的显示,礼仪的弘扬》,《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